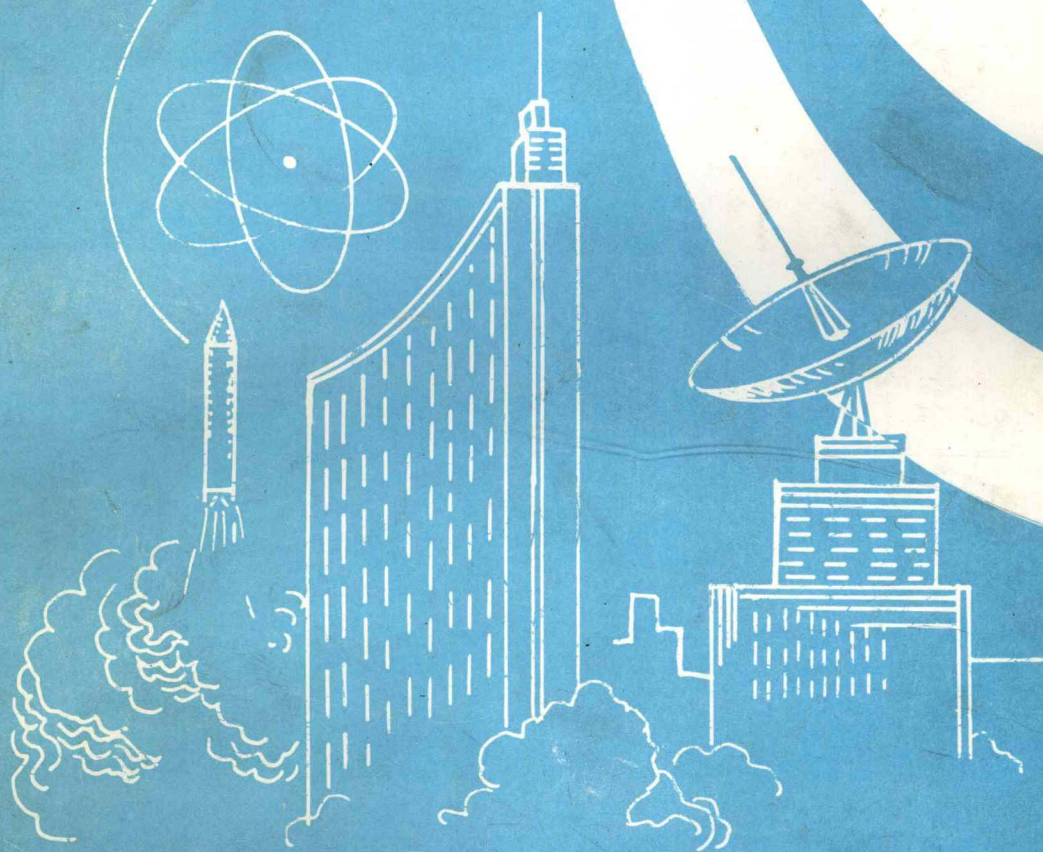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科研文萃

主编：王 阳



中国三峡出版社

高等教育科研文萃

(社会科学第五卷)

王 阳 主编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科研文萃/王 阳 主编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12

ISBN 7—80099—184—9

I. 高… II. 王… III. 高等教育—研究—文集 IV. G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11171 号

书 名 高等教育科研文萃

著译者名 王 阳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

华光印刷有限集团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印张:16 字数:38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80099—184—9/G · 58

编辑小组

主 编：

王 阳

副主编：

韩修勇 王名非

编 委：

马亚丽	王 阳	王桂亮
王名非	车绪武	李江梅
李家庆	李相合	吴振云
邹 琼	郝经瑞	常风芹
韩修勇	栗 瑛	颜景民

目 录

思 想 教 育

哲学的实践方法	韩煜旻 周宇豪(1)
权威的树立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郑 治(4)
从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论看毛泽东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李相合 曹 霞(9)
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陈 凯(11)
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及其启示	毕天云 李国琼(13)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巩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	颜景民(15)
试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从东西方社会对比看清末君主立宪	丁应通(17)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设	柯有华(19)
略论韩非的赏罚观	张福如(21)
当前企业党内民主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浅析	蔡少平(24)
新时期党建的若干思考	陈玉兰(26)
群众路线精神的展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剖析	周青山(29)
切实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	杨 梅(31)
浅谈高校工会参政议政	许启伦(34)
略论新时期传统价值观与现实价值观的矛盾冲突	迟有明(36)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许慧玲(38)
浅谈师专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袁继伟(41)
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	韩向利(44)
孝之述评	谢基昌(47)
道德危机、道德教育与道德他律	李天贵(49)
思想政治工作“反弹”因素浅议	刘书勇(52)
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探讨	张贞齐(54)
新形势下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刘文政 陈 敏(56)
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蔡桂生(58)
谈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林岳新(61)

教 育 管 理

美国高等学校本科生教学的思考	李家庆(63)
从招生并轨到自主择业看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常风芹(68)
专家群体参与社会决策的重大意义	李显卿(70)
关于高校秘书工作人员素质问题的刍议	方晓霞(72)
认清形势理思路 严把教材选用质量关	席彩丽(75)
试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向显智(76)
“双差生”心理特征分析及教育	车绪武 赵奔(79)
浅谈建立与完善高校人事管理中的监督约束机制	刘爱荣(80)
谈高校学生干部管理	颜景民(82)
高等师范院校审美教育谈	张绍藩(84)
高校学生工作与素质教育	王名非(86)
实践教学与素质教育模式构想	万钧力(88)
简论行政学校教师教学形象的评估标准	查桂出 张树俊(90)
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宿舍管理的探索	张艳梅(92)
客观分析 正确认识 推进工科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李宜祥(94)
研究教学对象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	陈宝英 刘淑萍 程春丽(98)
毕业生就业分配工作现状浅析及展望	李云海(100)
浅谈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顾锦彤(102)
浅谈大学生交际热的特点及其引导	白树震(103)
抓好课程评价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姚建东(105)
浅谈高师学校充分利用中专班次积极开展实习超前训练	杨笃庆(107)
增强党校教学实效性的几点做法	王 静(109)
素质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黄长青(111)
改革师专教师职业训练课程 提高未来教师素质	张悦红(113)
谈高校后勤临时工管理	韩根柱 秦培义 赵国利(115)
试谈现代管理中的激励方法	李上文(116)
办公室主任如何搞好协调工作	曹少平(119)
浅析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冯裕芳(121)
加强校容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韩根柱 秦培义 赵国利(124)
城市外来务工者管理教育问题刍议	鲍中夫(125)

语 言 文 学

“虚实相生”技法的审美特征	李江梅(127)
超越文本接受障碍	马 理(129)
炽烈的相思 理想的情爱——闻一多、徐志摩爱情诗比较论	彭在钦(132)

强烈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浅论刘绍棠的中篇小说	廖锦华(134)
电脑写作——写作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范高庆(137)
诗品与人品的伟大 理想与现实的对抗	蔚志坚(139)
言外之意细思量——简论古文鉴赏中的辨明寄托	李 枫(141)
语文教学中的图式建构	郝瑞经(144)
语文教学过程最优化	郝瑞经(145)
理解与情感的二律背反——1917—1927 年中国新诗发展追踪	殷连英(147)
“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由《随想录》看巴金的人品与文品	王建树(151)
中国古代寓言的对话艺术	郑 莉(153)
语文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郝瑞经(157)
试论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及其与文明城市建设的关系	刘冬英(158)
语文课要注重学生的语感能力	郝瑞经(160)

图 书 情 报

略谈我国成人信息教育	马亚丽(162)
浅谈高校图书馆灰色文献的收藏与开发利用	粟 瑛(164)
因势利导,办好继续教育——辩证地分析高校图书馆员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马亚丽(166)
在图书馆建立教育档案的建议	刘艳久 李河广(168)
深化期刊文献开发 提高服务层次	秦兆菊(170)
党校图书馆重视学员作业的开发研究工作	康荫明(172)
图书馆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徐 燕(174)
高校图书馆党支部如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钟铭佑(175)
高校期刊信息服务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探析	邹 琼(177)
关于加强高校系资料室建设的几个问题	阎淑侠(180)
完善期刊管理制度 提高期刊利用率	周亚坤(182)

英 语 教 研

英语姓名的翻译	刘莉丹(183)
对专业英语阅读课的再认识	彭建武 李庆新 张兴华(185)
英语听力课有效教学策略	吴秀秀(187)
浅谈翻译英语成语的十种基本方法	左 峰(192)
英语习语翻译浅说	张 莉 周树军(194)
试论翻译中的灵活对等	蒋 燕(197)
试谈英语的比喻(三)	吴振云 薛素雅(200)
修辞哲学与中美跨文化交际	单满菊(202)
论英语阅读课文选材的六大要素	裴克山(204)
文化背景知识是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郭香菊(207)

从阅读技巧入手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	董 天 祖 林 史玮璇(210)
文化导入与高年级阅读教学	王枫林(212)
有目的地读:外语阅读教学的交际任务	李 菁(215)
A Study of the Phoneme	梁晓红(217)
Thoughts o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in Classroom Instruction	于宏伟(220)
On the Goodness of Jane Eyre's Character	黄 鸣(224)
影视教学与交际能力的培养	刘玉霞 陈世良(227)
谈非英语专业学生如何提高听力水平	于卫华(228)
浅谈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基础阶段教学	姚盛春(230)
浅谈语篇分析及其教学模式	张 颖(232)
关于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几点思考	高登亮(234)
浅析成人学习英语的方法	张万东(236)
精读课文教学法实践及探讨	魏菊红(237)
浅谈听说教学中语感的培养	司桂风(241)
浅谈成人中专英语课程教学的实践与体会	李 芳(243)
科技英语中被动语态的类型及翻译	陶振英(245)

思想 教育

哲学的实践方法

郑州大学 韩煜旻 周宇豪

人类丰富多采、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方法的多样性。本文旨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实践对变革和推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方法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凭借的途径、程序、形式、理论、原则、手段、工具等。方法分为认识方法和行动方法即实践方法。

实践方法是哲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基本的方法。实践,简单地讲就是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客体的过程,即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地改造客观外部现实的活动。实践方法是人们按照预期性的特定的目的对客观存在的外部对象改造的具体途径、所需手段和活动过程及具体方式。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深刻理解和正确掌握实践方法对于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对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对于规定人们探索和变革社会的行动方式,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人们去改造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实践的逻辑起点

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物质、精神财富的逐渐增加及积累,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和目的,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和目的,才促使人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实践方法去创造所需要的结果,达到人类的期望和要求。

因此,目的即是决定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方法的原动力。我们知道,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们一定的需要,即为生活和生产的消费提供现实的对象,这种需要在实践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不存在这种需要,人类就不会有任何实践活动。列宁说:“……人类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①因此,实践方法的逻辑起点就是主体改造客体,即人们之所以探求和变革社会过程的目的。那么,对处于实践起始阶段目的把握有哪些方法呢?主要有两种方法,即:价值测量法和功利目标确立法。

1. 价值测量法。所谓价值测量法是指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所创造的物质价值和从量的方面进行评估、预测、衡量的方法。

那么,怎样对价值进行衡量呢?首先,确定价值衡量的客体。基本要求即是能够满足具有经过信息中介作用主体的功。由于任何客体本身的蕴含潜存的价值,这就对满足主体的需求,形成价值尺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价值客体的多样性及其属性的丰富性,能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满足主体的各种需求。因此,客体的属性须成为一种外在的吸引力和诱惑力,驱使主体不断向价值客体靠近,成为役使主体趋向客体的力量,以此来满足主体的需求。所以,主体应该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特有属性的客体作为价值测量的对象。其次,价值测量的基础在于设置价值目标。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两方面:一是认知活动,其结果产生“事实认识”;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2页

认价活动,其结果产生“价值认识”。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这两种认识的有机结合,就融合成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事实认识是客体的属性和规律的把握,这是制定客体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前提条件。价值认识是人们用来判定客体的那些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价值认识使所提供可能性变成现实,从而使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功用结合起来,准确地设置价值目标。再次,对价值的测量必须遵守客观世界的规律,受客观条件及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制约。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反以主观愿望去随意设置价值目标,势必导致实践的盲目性和非现实性,从而选择错误的实践方法,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最后,价值测量的外部现实即对象经过实践后产生的结果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在设置价值目标时应该认识到,这个目标作为实践目的参照系经过创造性活动能够产生一定的客观现实对象,不能是仍处于理想化的、假设的状态。

2. 功利目标确立法。功利目标确立法是指促使某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或者减少社会的、个人的利益和要求。确立功利目标的方法就是主体在制定实践目的前对所要达到的功利目标进行预测、分析和确定。从这个定义上可以看出,功利目标确立法包含有三个因素:第一,确立功利目标的主体,即有意识、能思维、自觉活动的人;第二,确立功利目标的客体,即对象;第三,实践主体对目标客体的功利进行分析、预测。

运用功利目标确立的方法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目标对象的设置必须是客观的或者能经过实践创造后产生的结果是客观的;二是对客体功利目标的设置必须受客观规律、客观事实的制约。

综上所述,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更加深入和发展,对处于实践起始阶段目的把握的方法会越来越多,从而使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选择更高级的、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精神文明生活日趋完善的实践方法。

二、对实践经验的感知

人们根据客观物质的规律,一旦确定了改造外部客观现实的目的,就必然会采取一定的实践方法并按照这个方法去重塑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方法具体地被操作,人类凭着自我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于改变客体的具体环节所摄取的信息、资料就是实践经验。

所谓实践经验的感知,就是对主体在实践方法具体操作中实践活动本身、实践的手段、实践活动通过手段作用于客观对象产生的结果等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知识、材料等的感觉和体验。这种感觉和体验通常以感性的、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继而对其之进行理性的抽象,以理论的方式被总结、概括出来。

实践经验的感知方法主要有信息感知法,即对实践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客体的外部世界进行改造过程中所获取的各种信号、资料以及知识、学问等的感觉和认识。

对实践过程中的各种信息究竟怎样感知呢?

首先,对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信号、资料进行搜集、储存,这个过程主要通过直觉来完成。同时伴有其他思维方式。现代神经生理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的各种感觉器官由于“专业化”分工不同,或同一感觉器官,由于不同的神经组织和特异性细胞,从而都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信号有着不同的反映,搜集的信息也是不同的。听觉可以接收声音的信息,嗅觉可以接收气味的信息等,视觉器官对外界不同信息的接受、加工和处理更是由“专业化”的神经细胞来进行的。可以说,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的众多的特异神经细胞,都是对应于各种信息各司其职的,这就使其信息的接收、储存成为可能,人的不同的感觉器官感受到不同的物质刺激,搜集到不同的信息,这是信息感知的第一步。

其次,对实践中搜集、储存的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加工。要想把实践中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传达到大脑中,各种感觉器官必须把接收到的各种物质的信息,都一律编译成生物电流的脉冲信号,这些电脉冲信号携带着一定信息,沿着神经纤维通路传递给大脑,于是人的大脑就开始进行极为复杂的变换活动。首先在神经元网络上以电信号的特定的时空分布形成一个相应于客观对象的主观印象,继而对其迅速地进行分析和选择;还可以随时根据外界的刺激和需要显现记忆中的信息,在脑中重现以前的映象;还可以加工、改大信号,使各种信息自由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形成新的映射。人脑的这种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它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信号的分析、综合的意识过程。

三、实践的动态运动

人类根据一定的目的,对客观对象改造的过程包括对目的的价值衡量、选择的具体手段及手段被具体操作和产生的结果,可以说,实践的整个过程都处于动态运动之中。

把握实践动态运动的方法主要有监控法。

所谓监控法是主体对实践过程中目的的确定、手段的选择和手段被具体操作执行及由此产生结果的全部运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督、控制。

怎样运用监控的方法呢?

1、对实践目的、手段的监控。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由一定的目的所决定,由一定的手段来执行的,因此对实践目的、手段的监控是保证目的、手段选择过程中不受其他外界因素干扰的重要保证。首先,将对目的、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以直觉映象的方式储存在人的大脑中;其次,对这些因素分析、整理,从而使目的、手段的选择不仅符合实践主体的愿望,而且能够遵循客观的规律。

2、对实践的具体手段、方式被操作、应用的过程及所产生的结果实行监控。这是保证整个实践活动不背离实践目的,使实践按照目的要求稳定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对实践过程具体方式被运用、操作的监控过程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原则,随监控对象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发展而不断地调整监控方式。首先运用实践主体的直觉及先进的科技仪器对实践全部过程中显示的各种信号进行感知、确认及原始地摄录、储存监控材料。其次,对于储存到的材料进行理性的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完成对实践过程的整体监控。

四、实践的系统整合

人类的各种实践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实践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系统整合就是具有一定联系的既能对外部现实产生反应的整体中的各个要素按照逻辑的、规律的特点进行整理、组合,而实践的系统整合是指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目的、工具、方式及手段被具体操作的过程和实践结果等的有机结合。

把握实践系统整合的主要方法是系统分析的方法。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对人类实践全部过程的整个系统内的基本问题作全面、客观的调查研究,运用系统观点进行思维推理,在确定或不确定的条件下,探索各种可行方案,通过分析对比,选出能够达到实践主体预期目的的最优方案的一种决策方法。

在实践中正确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目的分析。系统分析的目的虽然是指人类实践活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是,由于事物复杂性的影响,人们对实践目的的选择,往往受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所制定的实践方案很可能有不完备不周密之处。所以,在实践主体作用于外部客观对象的活动中,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干扰,出现未曾料到的新情况、新变化,人们就必须把握其中有利的因素或情况,抓住时机,因势利导,而对于不利的因素或情况,则必须设法排除克服,或统筹全局利弊以修正实践方案。另外,即使实践目的和方案正确,在具体实施实践方案的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偏差,此时主体就必须反馈调节理论知识向实践技能、技巧的转化,使二者趋向一致。一旦发现自身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新工具、新问题、新情况不相适应时,主体就必须更新自身的理论知识,以达到更高水平上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与实践结合的三者统一。

2. 收集资料。主体对实践目的、选用的手段确定以后,就要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显示的各种信号进行充分地预测、整理,广泛收集与之有关的各种材料和数据。只有收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料才能为分析判断提供科学的依据,否则系统分析的结论将是不完全、不正确的,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

3. 建立模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纷繁复杂,实践目的、所用工具及方式确定以后,如果马上将实践的过程展开,有时会产生与目的不相符合的大的反差,因此,为了减少实践中出现的不必要的误差和错误,可按照目的要求,建立与实践过程相似的模型。建立模型是简化对实践过程分析判断,提高实践功效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尤其是对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对实践全过程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所谓对实践全过程进行分析,是指先将实践的整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比如可分为目的系统、手段系统、手段具体操作系统等,然后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在各子系统分析取得成果后再进行综合。

综合评价是系统分析方法中的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环节,它是用系统的整体观点,以各种不同的角度评价各个子系统及整体系统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评价,首先应建立一套明确、详细,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标准,建立评价标准的依据应是系统分析的目的、实践主体的要求及实践的性质、条件等重要因素。

通过对实践方法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实践的整个过程即是根据客观对象的属性和规律,人类按照一定的目的,改变对象的客观存在形式,使之适合人类目的的主观规定,成为人类目的的客观体现物,因此实践的全部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渗透和辩证统一。

权威的树立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郑 治

“领袖”作为一个概念被分解得支离破碎,目前流行的用法非常广泛,常见的有宗教领袖、民族领袖、政党领袖、国家领袖、地区领袖、部落领袖,等等。据国外的一项统计,“领袖”一词有130多种定义,诚如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领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有关领袖的核心定义至今尚未出现”^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哲学标准,没有理论和经验上的积淀,没有起指导作用的概念,并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经验,我们就失去了了解和认识领袖这一存在于艺术、科学、学术、政治、各行各业,以及战争等牵涉和影响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现象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在运用“领袖”这一概念时,总是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或涵义。本文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运用含义较窄的“政治领袖”概念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列宁有一个著名的关于政治领袖的定义:“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② [关于这里的“领袖”一词是单数还是复数,70年代后期在我国曾经有过一场有趣的讨论^③,在本文中,我们从词语组成(……领袖的人们)以及现实状况出发采单数义]列宁还有其他类似的论述:“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 又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人’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⑤ 列宁的这些论述指出了“领袖”的最基本要义,这就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权威(通常有与之相应的最高职务形式)。

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剑刃》一书里,把智慧、天赋和权威看作是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三种关键性品质: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他需要有智慧和天赋,而为了说服人民遵循他的路线,他需要有权威。^⑥

由此我们认为,领袖地位的确立,是与权威的树立联系在一起的,领袖即权威,绝对的权威。如果缺少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为他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一致认同的权威,他就不足以担当领袖的重任,也不足以被人们从形式上认同为领袖。一个政治家要取得领袖地位,他必须树立两个方面的权威:一是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使人们确认了他的导向作用和领导才能,我们称之为“经验权威”或“实践权威”;二是在总结实际政治斗争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将其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理论化、系统化,形成自己超出其他领导人物、指导政治斗争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理论权威”。经验权威和理论权威的树立,二者缺一不可。

在大体确定了领袖的“基本要义”之后,我们再来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其经验权威和理论权威的确立,从而说明毛泽东被认同为中国共产党领袖这一过程的艰难曲折,并可对毛泽东思想何以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向成熟作出另一角度的解释。

①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③ 参见李洪林:《领袖和人民》(1979年1月),载李洪林:《理论风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④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⑤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

⑥ 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1. 1935年遵义会议及至长征胜利,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实践(主要体现为军事斗争)的经验权威得到认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核心。但这并不表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更不用说领袖地位),对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过非常细致的分析。^①通常的说法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如,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②(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又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③(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倒是张闻天的下述说法更为符合当时的实际。1943年12月,张闻天曾指出:“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④(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但这两个限定词在后来的说法中逐渐消隐)。

我们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最高决策核心,表明自中共成立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贡献在党内得到相当认同,或者说,表明毛泽东领袖地位确立过程中的经验权威开始树立。

大家知道,毛泽东是中共的缔造者之一,但开始只是党的湘区委员会的负责人。直至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和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并不足以影响中央决策。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以之指导“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1930年12月至1933年2月间,根据地军民相继取得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和战略战术的正确性;而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间第五次反“围剿”因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遭受惨重损失及被迫长征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被动挨打的局面,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于当时党和红军领导者的怀疑和不满,“想念毛泽东”是当时红军将士相当普遍的心情。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⑤郭化若也回忆说:“‘毛委员有办法!’这是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毛委员就是有办法,而且有的是最好最妙的办法。”^⑥

因此,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举毛泽东参与领导红军今后行动的倡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种选择,无疑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战术原则及实践经验的相当认同。

但是,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够坚定的。”^⑦遵义会议后的三个月时间内,红军未能实现遵义会议所提出的带领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与红二、六军团或红四方面军会合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三项主要任务,也有过战场上的失利。因此,当时不仅下台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服气,而且连一些原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对毛泽东的指挥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比较尖锐的否定意见。^⑧

直到1935年5月初,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初步实现遵义会议所确定的第一项战略目标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威才有所提高。之后,又经过了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斗争,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1936年12月,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

① 有关的观点可着重参见董世明:《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顾关林:《试析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本文赞同他们的观点,故对其材料及论点有所借用。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一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0页。

④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转引自《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⑤ 刘伯承:《刘伯承回忆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⑥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⑦ 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⑧ 参见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1986年9月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2期;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259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委员会组成,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至此,毛泽东在事实上、职位上都成了党内最高军事领导人。表明毛泽东作为党内最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已为全党全军所认可,或者说,在领导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主要是军事斗争),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使其经验权威得以树立。

2. 经过巨大的理论工作,毛泽东构筑了他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领袖地位确立不可或缺的理论权威的树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但应该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还应该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

如前已经指出,毛泽东自建党后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是党内其他人所不可比拟的,已经树立了作为党的领袖的经验权威。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及其后相当长时期思想理论准备与建设的不足,因而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面,尤其是理论体系的建立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整体而言,还是对毛泽东个人而言,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五四”及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他的贡献;尽管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文献);甚至尽管在至关重要的1927—1936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之中(理论著作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范,思想上的远见卓识及理论上的独创,最懂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但是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并没有得到全党的“公认”。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甚至曾被教条主义者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山沟里的他的思想不被收入马列主义的门宗。就是在遵义会议上,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①这表明了其对毛泽东理论权威的蔑视,无疑对毛泽东刺激至深。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处处以国际代表和中共党的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问题在于:王明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并不能为全党所认识,有的同志对毛泽东、王明的原则分歧“模糊不清”,不知谁对谁错。王明回国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37年12月9日至14日,通称“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②

更为严重的是,王明的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这本小册子写于30年代初,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作,由于他抄摘了大量马列著作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用教条主义唬住了相当一部分人。这本小册子曾于1932年2月在上海正式出版。但是,时隔8年之后,在经过了革命的严重挫折和红军被迫长征这样重大的历史曲折、经过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经过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按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维护和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这本小册子居然又能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这一方面说明了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同时也说明党内相当部分同志对王明的错误还认识不清,还没有识破党内教条主义者的面目;还说明了毛泽东的理论权威尚未确立。

这其中的深刻背景有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自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一种倾向(观念),这就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必须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斯大林为了反对理论上的强大对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斯大林没有列宁那样的理论修养,也没有托洛茨基的修辞学,同时并无布哈林的那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雄厚基础)而从哲学上为自己奠定基础,也留下了一批经典理论著作,著名的如《论列宁

^①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② 这次会议按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讨论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上,毛、王之间严重分歧。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设总书记,增补王明等人为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仍管党务,统战划归王明负责,毛只主持军事。而在会议之前,毛分管军事和统战(这都是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显然毛的领导地位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削弱。后来,毛甚至处在少数乃至孤立的地位,他曾抱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这种状况直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得以根本改变。

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并作为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程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推荐,宣传机器把斯大林宣布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的第四位经典作家,并开始出现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的严重教条主义倾向。这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思想理论建设的实际状况。中共在创立之中及成立之后相当时期内,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和建设存在不足,这当然是由于现实革命斗争任务的紧迫。同时,从中国的思维传统看,中国传统思维似乎并不太擅长以逻辑思辨为基础构成严谨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不如德国、英国、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那般总能构筑其庞大的理论体系;从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来看,中共成立后,她的主要成员来自产业工人、来自农民,文化落后,加上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所以思想理论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无疑会受相当影响。以当时中共一般党员的认识,当时普遍看法,以为理论也者,就是指书本上的话而言,谁背书最多、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王明等人惯于“引经据典”,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教条主义者把自己称作“理论家”,党内也有不少人承认他们是“理论家”。

因此,破除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也是毛泽东树立其理论权威,从而在根本上确立其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的目标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要达到完全独立自主,并具有自己的特别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因读马列的“本本”不多而被党内一些受教条主义束缚的人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毛泽东后来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②毛泽东的读书是为了著书,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从实践经验而来的、归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到延安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极大地充实自己,他利用相对安定的环境和较好的读书条件,广泛收集马列的书籍,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恩列斯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并且在思想理论方面着重清理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倡导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工作。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是其它时期不可企及的。有学者统计,现今收集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中的159篇文章中,有73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另外还有111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③这些著作不仅写作质量高,而且长篇、系统的著作多,报告、讲话、指示之类的东西少;同时许多重要著作,都是紧接着写成的,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都是1938年5月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的完成只相隔一个月。这些著作成为毛泽东1949年以前时代所有主要的理论著作。毛泽东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详尽的阐述和确定性的解释”,“明显地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表现为一种成熟和完满的理论形态。”^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和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的这些理论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问题,以及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从各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⑤,表明毛泽东思想这时已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经过延安整风对教条主义的彻底清算,毛泽东以他理论方面的非凡才能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权威地位。^⑥

延安整风期间,许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纷纷论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逐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必须指出的是,这时作为整体概念的“毛泽东思想”,显然指的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这一状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逻辑厘定)。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载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③ 参见宋镜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载康裕震等主编:《半个世纪后的评说》(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刘李胜、陈建涛编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⑤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⑥ 就连王明也于1940年5月3日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是公认的领袖”。(1940年5月7日《新中华报》)

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用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①

王稼祥(是一位曾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中央领导人)在1943年7月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他在为纪念中共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②

其他，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也都对毛泽东的实践贡献和理论建树给予了推崇备至的评价。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尤其重要的是，会议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赋予了毛泽东拥有的绝对权威地位。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一切工作的基本指针，“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③“七大”的召开，表明毛泽东的权威达到顶点。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至此，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终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正式确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没有伟大而艰巨的中国革命实践，就没有在这个实践中毛泽东所确立的经验权威，就没有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权威的树立。“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④

①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37页。

② 王稼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6月1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④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从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论 看毛泽东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内蒙古师范大学 李相合 曹霞

5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是第一部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虽然教科书中有许多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在毛泽东倡导下曾掀起过一场学习教科书的高潮。毛泽东反复阅读,并多次与有关同志讨论。毛泽东关于教科书的评论其中不乏闪光点,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一、计划与市场结合思想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建国初期,他曾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认为商品及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经济建设中可以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团结几亿人民。他还强调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①。很明显,这时毛泽东的观点仅仅是在过渡时期可以利用商品经济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挫折和教训,使他认识到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仅不能废除,反而还要利用它、发展它。毛泽东在论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将来总有一天要不适应生产力的,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②。在这里毛泽东明确的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它们还没有完结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把商品经济“发展下去”。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存在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毛泽东在谈市场与计划工作的关系时指出:“在计划工作上,什么帐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不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④。就是说在经济工作中不作计划,没有计划调节手段,而是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或者不考虑市场因素,一切都纳入计划,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能保证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工作中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我们的认识这样全面、准确,他强调要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⑤的原则。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⑥。认为国家计划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可见毛泽东在当时已经认识到经济工作中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只是更强调计划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正确思想,随着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改革的目标日益集中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改变过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忽视价值规